

# 紀念蔡元培老師

曹建

我在民國十年進入北京大學預科肄業，十一年下半年，蔡子民（元培）先生自己特開設「美學講座」。我在這時候已決定明年本科要入哲學系，在該系，美學是必修科門。據一個同學告訴我，先生很少自己開教壇的，這一難得的機會，自然不肯輕易放過它。加之他授課的時間適逢我沒有功課，於是進去旁聽。教室是用第二院的禮堂，這個禮堂原是前清某公主的銀安殿，這時候

校中正把它藻飾一番，雕樑畫棟，真是輝煌悅目。這個禮堂有百多個座位，我第一次去時已坐滿了人，只得站着聽。先生在教育總長時原是肆力推行國語運動的，但是他講課時用的是改良過的紹興官話，使沒有國音天賦的南方同學越聽越多，有這個天賦的北方同學却越聽越少；但是加入的比退出的少，使座位慢慢地鬆疏起來。我不知道是從那時候起，得以靠進最近先生的座位，因之先生所講述的每一字每一句都聽得清清楚楚。先生講述時態度嚴肅懇摯，出語簡潔明白，深入淺出，段落井然，我把它一句一句記下來，就是一篇圓潤無瑕的好文章。不幸的是我們受教不到三個月，先生因不滿北京政府誣構財政部長兼北大法律系教授羅文幹罪狀，辭職離平，使我們不能聽完先生這一美學全部課程，同時我入正科以後，就再不能得到一位像先生一樣的美學或藝術學的教師了，深為一生的憾事！



民國十年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時的蔡元培先生。

## 年譜記事三點商榷

蔡先生一生言行，有其一定的軌則，其

事蹟見諸於他的自述和友人學生的記載。我最近看到中央研究院陶英惠君所著的「蔡元培年譜」（上），其中搜羅材料的豐富和選擇的精審，尤為往日所未見。翻閱此書，則先生一生行道軌跡，可說一覽無遺。但其中有多處尚須探討的似應及時提出，藉正視聽。

（一）曾記民國二十二年初夏，我在上海中華日報館主持筆政，對先生的行誼亦有扼要的敘述，見於是年夏月該報「星期專論」首行。其大意是：「先生不論站在如何崇高的地位，總本著平民的態度；不論上了多大年紀，總有青年的思想；不論處在如何繁忙的時間，總離不開書本；只要遇著無禮無法的事情，即會勃發革命的精神」。其中尤以新思想和革命精神二種為先生的天賦。在陶著的先生「年譜」中，說他「到了二十八歲才走出傳統思想的象牙之塔，投身於新思潮的洪流中」（見「蔡元培年譜」第五八頁）。又說：「偶於書院中見四書文即八股文，輒以古書中通假之字易常字，以古書中奇特之句法易常調，……其後參加鄉、會試，也都是這樣作法，當時一般人稱之為「怪八股」（年譜三三頁）。這段記錄較

諸我親身聽到先父之言，頗有出入。曾記少年時先父對我說過：「清光緒十五年，我十五歲進學

（中秀才），蔡鶴卿（先生早年之字）中舉人年廿三歲，當時他的試題出在中庸裏：『日月星辰



蔡元培與吳敬恆合影。

繫焉」。他摒棄舊時天地不動，和日月星辰繫繫天上的說法，而採取新學說地動天不動。並將此句改讀為『日，月星辰繫焉』。並謂『繫』古通系，就是太陽系。採羣星繞日而行，及地球不外乎諸星球之一，與月是繞地球運行之說。在前朝作八股文，必須按照先賢的注解來發揮，如有逾越，即以離經叛道論罪，而先生此文反蒙錄取，當時的人稱為怪事一。此即「怪八股」一語之由來。至於蔣夢麟先生說「先生考舉人以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作首句，而獲中」的話（年譜四五頁），尤不可採信。因與試題真似風馬牛不相及。

上海分會會長。但先生喜談教育和美術，從沒有把「革命」二字叨在口邊。曾記一部「革命逸史」記載某一革命大事件係先生居中策劃領導。二十三年秋，我在上海會當面問過先生，先生答以「時間太久，都已記不清楚了」。不承認，亦不否認，而且言外還帶有不祇此役的餘意。我們對於他一生革命偉績，如確知之應予宣揚；假使記錯了，應予改正。如陶著「年譜」載光緒三十二年春說先生同里任紹興學務公所總理，爲了月薪三十元受人反對而辭職一節（年譜一七二頁），似有玷及革命偉人之處。我們祇要將其鄉縣與先生同時而且同爲革命同志紹康君當時所做的事予以比較，即明真相爲何若。紹康是浙江曠縣人，是光復會中堅份子，在鄉間以烏帶黨相號召，人恆呼爲牛大王而不名。其子鳴濤抗戰期間，任浙江省政府保安處處長。二十九年春先生逝世時，鳴濤爲文悼念與其父的交誼說：清光緒三十二年間，先生應紹興學務公所之聘選鄉，暗中借此佈置革命計劃。不久，紹興知府某獲得密報，擬予逮捕，先生得同志暗通消息，潛避至曠縣，匿居於鄉間竺家。旋又被該縣知事探知，欲率兵來捕先生。其父揚言道：「如果真有此事，我即當率民衆千餘人來破城，首在曠縣城樓樹立起義旗幟！」此言獲得嚇阻作用，該縣知事竟不敢輕舉妄動。其父旋派人護送先生由小徑至寧波返滬。民國前三年，其父因病去世。光復後先生感念其父有救命之恩，集資建墓於西湖放鶴亭畔，藉供後人憑弔。現竺鳴濤君雖已逝世，其夫人還健居在台北，可以探問，將知更詳實的事情。（二）

年譜」上第四四九頁引上海時報載袁世凱匪四干佛郎接濟汪兆銘與先生二人尤為不妥。不管袁氏是否有此事，而此種捕風捉影與袁氏憤施顛倒黑白伎倆，竟載入一介不妄取的先生年譜裏面，實失審慎。

### 議會風潮凜然難犯

我在中學時，即已心儀先生是當代的思想家和革命家。民國十年秋間幸得考入北京大學，很想早日得見先生，苦不得其門。有一個同學告訴我，想見蔡校長一面並非難事，祇要在上課期間內每天上午八時或下午二時站在第一院大門邊，就可如願以償了。一日，當我站在大門前等候時心裏暗想：他必定是一位西裝革履神采飛逸的人物。及等到一輛馬車到大門前停下，走出一位身穿半新不舊的長袍馬褂。頹下飄著稀疏不長不短的鬚子的老先生走出，神色內斂，態度恂恂如也，雍雅如也，很像一個道學先生，和我平日所想像的判然兩人。直到是年十月間，校中突發講義風潮，此種印象才發生改變。所謂講義風潮，是由於校中各教授和講師於授課時大都隨發一種講義，至課畢為止。此種講義不少出自國內名教授之手，十分珍貴。全校學生不論選修與否，都願意要得一份。校中慣例，要講義的學生只要對管理分講義的工友關照一聲，明天你的講義格子裏就有你所要的講義，而不取分文。這時候校中經費已現支絀，對此龐大開支欲謀補救，於是決定酌收講義費，因此引起全校學生的反對。有一天下午，滋事的學生聲勢洶湧，擠到第一院，要

找總務課長沈士遠說話。我是隨同看熱鬧的人。當羣衆擁上第一院第二層扶梯時，先生出現了，舉起右手拳頭厲聲問道：「你們鬧什麼？」學生齊聲道：「不關先生的事，我們是來質問沈士遠爲什麼要收講義費。」先生說：「我是校長，一切事都由我決定，與沈先生無關。」學生又起鬨。先生大聲說：「我是革命隊伍裏鍛鍊出來的人，你們如帶有手槍炸彈，儘可以拿出來對付我，我不怕！」那一種剛毅果斷、勇敢負責的態度，不覺把他當年推翻滿清專制政府時一種豪邁勇猛一往無前的革命氣概完全發揮起來。正在僵持的當兒，忽閃出圖書館長李大釗，把學生勸回去，他表示負責會給學生們滿意答覆。後來調解的結果，爲首的學生勒令退學，講義費照舊不收，不過僅限於當堂聽課的人而已。

### 浙江青年團的往事

還有一樁事也值得記述的。當民國十六年年初，國民革命軍將從福建進入浙江的時候，北大浙籍學生忽然提議組織一個革命團體，表示響應。當開成立大會討論會名時，有的主張用「浙江青年團」五個字，又有提議於「青」上加「革命」二字，最後一位姓董名秋芳同學站起來說：現在國民黨分左右兩派，我們知道左派是革命的，右派是不革命的。我主張在「革命」上還要加「左派」二字，大家拍手贊成。旋即成立領導機構——幹事會，推舉李宗武（字季谷，剽匪時期任浙江教育廳長）、鄭奠（介石，後任北大國文系主任）、何聯奎（子星，曾任故宮博物院副院長

六十六年二月間逝世）、馬復（粟生，後任武漢大學教授）、董秋芳清黨後不知所終、陳君（已忘其名，時任北京圖書館秘書）和我七人爲幹事。當北伐軍已進入浙江省內時，該團體團員增至二百餘人，議決回浙參加實際革命工作。七個幹事中，除陳君因爲館務所羈不能同行外，其餘都先後返杭。其時先生正任浙江政治分會主席。我們七個幹事，內有一個馬復同學和先生關係最深。因他的父親和先生是表兄弟。先生清末革命工作時，精神和物質上都受到他父親的扶助，不料革命快要成功時不幸去世了，因之對馬復視同親子一般。二月初，當我們相約南返時，馬復大概因旅費關係最後到杭。他一到杭州城站下了火車後馬上晉見先生，並把所攜帶的我們團體章程給他看。先生一看到章程上的團體名稱臉上就變色，問道：「馬復！我真不明白他們弄這個團體是什麼意思？假使爲的是謀事，現在此地的機會著實多呢！」——說句真話，我們弄這個團體真正意思何在，當時除董秋芳一人外，其餘全蒙在鼓裏。至於找工作，除馬復因先生叫他回轉北京結束其還有半年學程，及我回到浙東真是幹起青年運動，隔了二個月，清黨事起，給人疊狀誣控，幸賴洪陸東（原名東海，時任省清黨委員）同學洞悉實情，予以昭雪外，其餘諸位，都獲得雖然不怎麼大也不算小的事，如李宗武任省立第一中學校長，鄭介石任省教育廳中等科科長，何聯奎任省黨部秘書，董秋芳任某中學校長等是。先生又接著說：「你們不可以憑空捏造不分皂白來攻擊人家，你們如果這樣做，人家會拿

事實還手打你們的」。馬復聽了更是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急不擇詞回答說：「鶴卿伯喈，我們都是紅蘿蔔（北方叫大蘿蔔）啦，表皮紅，皮裏全是雪白的！」先生才現莞爾，不過這個青年團體，也是由於先生之不高興，當時就消散無影無踪了。至於這個團體產生的原因，後來大家也漸漸明白起來。因為中國國民黨開左右派，到這時候，更現劍拔弩張的形勢。在中委方面，右派有西山會議派，左派有跨黨和親共的；形成組織的，右派有孫文主義學會，左派有中國共產黨。先生對於堅決反共的中委，如張人傑、吳稚暉、李石曾、張繼諸先生，不僅是生死患難之交，而且同是兼信無政府主義。而後來成爲中國共產黨首領的陳獨秀和李大釗，所謂南陳北李，都是先生初任北京大學校長時延引進來的，所以先生在這時候於政治方面確成各方景仰、舉足輕重的人物。但是這時候日夕隨侍先生的有幾位是孫文主義學會的中堅分子。對此，北大左派學生，當然不肯漠然置之，於是暗中策動成立這個團體，並想借重馬復和先生有深切的淵源來轉移其視聽。但是時間晚了一點。就在馬君到杭州前幾天，杭垣曾舉行羣衆大會，先生以浙江政治分會主席的身分登台演說，有幾個自命爲左派革命青年，指著先生大聲喊叫：「你們看這個投機分子來了！」

先生當時就怒不可遏，大聲叱道：「我開始革命時，你們全沒有出世呢！」先生器宇恢宏，如輕微的挖苦他幾句，像陳獨秀說他是「最固執（還好沒說最頑固）的人」，——因爲在先生任北大校長時，教授成分非常複雜，到民國八年還有矢

忠清室，拖著辮子上課的辜鴻銘，有主張君主立憲、投入袁世凱的「籌安會」爲六君子之一的劉師培。一班自稱爲新青年的教員無日不想把他們驅出校門，而先生固執不肯，說：「辜先生的英文和劉先生的國學是國內數一數二的。大學學生對政治主張有辨別是非的能力，我是希望學生學辜、劉二先生的學問，其他可以不問」。又像胡適之先生說他是「大笨伯」，——因爲先生寫過「石頭記索隱」，說此書不是言情小說，而是政治小說。其宗旨是「在弔明之亡，揭清之失」。并說書中之人，都有影射。例如說賈府，指偽朝滿清；賈政是吏部，賈赦是刑部，賈寶玉是偽朝的帝系；林黛玉影朱竹垞；薛寶釵影高江村；王熙鳳影余國柱……。

胡適之先生在「紅樓夢考證」裏說先生「走錯了道路」，說他「收羅不相干的零碎史實來附會書裏的情節」，因之說先生是「笨謎」和「大笨伯」（似應改喚「革命謎和大革命伯」）。先生於「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中，以溫和簡明答復胡先生所說的話，毫無一點火氣。先生一生從未破口罵過人，即人家加他以惡言諷語，也從未聽到他反唇相譏。但是人家對他誤解、誹謗，甚至攻訐的話，如不傷及他人人格的，大都一笑置之。惟獨對於「投機分子」，或「新官僚」這一類名詞，他絕對不能忍受。像最先破壞中華民國共和國政體罪魁，而又是北洋軍閥開山祖師的袁世凱，先生只說他是一個「新官僚」，可見「新官僚」一詞的涵義，在先生的腦子裏，含著反民主、反自由和口是心非、無惡不作等成分的。

至於「右派」或「左派」等名稱，先生看來，尤覺好笑。因社會主義的要旨，在乎「各盡所能、各取所值」，而無政府主義，則在「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比社會主義還要進一步，而且爲先生所樂道。但實現時期，國父說要在「國民智識道德完美之後（見民元社會主義派別），及人類生活要達到最繁華階段（孫文學說第二章）」。

蔡先生也說「有一介不取之操，然後可以言共產」，這些話都可以證明所有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都不是現階段可能實現的。所以先生革命的歷程，起自我們還沒有出世之時；至於完成，不知在我們子子孫孫孫子子究竟是哪一代。現在有人公然給他戴上「投機分子」的帽子，他老人家怎能不生氣！先生一方面排斥共產黨人的橫行無禮，同時也糾正民黨同志模仿其方法，曾說：「若口唱三民主義，而精神上不是法西斯，便是波爾雪維克，那就是孫先生的罪人了！」（見先生「三民主義的中和性」）。

蔡先生如晚歸十年，目擊大陸淪陷後共匪那樣的蹂躪民權和殺人遍野，其憤怒痛恨之情，更不知如何的了！

## 北大同學黨務工作

我於民國十年九月間進入北京大學預科肄業。在第一次上課看功課表時，遇見一位濃眉大眼身軀高大的同班同學站在我身邊也在看課表，在一次偶然交談之下，竟使我一生起了不少的波瀾！此人姓鄭，名業，字居之，是山西省忻縣人。

在預科二年裏，和我同桌聽講，又同出遊玩。他住在學生宿舍——東齋，同住的是一個湖南人郭春濤，他後來在本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就當選為候補中央監察委員。有一天，鄭對我說：「老郭想介紹我入社會主義青年團，我答應他要和你一同加入。」我回答說：「聽說社會主義的派別很多，我要把它研究一下後再說。」我於是把有關社會主義的書買了好幾本來看看，但得不到明晰的概念，直等到十一年秋間先生講美學時，附帶提到各種社會主義的派別，以及看了國父「三民主義和社會主義之派別與方法」演講，才把中心信仰確定下來。十二年後，他遷居中老胡同三號。有一天徵求我加入中國國民黨，我同意了，他替我找好二個介紹人：一個是住在該胡同斜對面六號的譚熙鴻，他的夫人陳淑君就是陳璧君的嫡堂妹妹；另一個是郭春濤。不久，他又對我說要到京漢鐵路上做工人運動，有相當久的時間才回來，叫我搬到他的房裏去住。搬去時他把一包東西交給我，內部有最重要的像學校裏的畢業證書一般的黨證簿一厚本和石章一顆及其他零碎東西。隔了一些時間，房東——是旗人老太太，叫人關照我，要把重要東西收藏好，現在警察對我很注意，我出去上課時，也看見一個警察對我盯着看，我才知道我現在所住地方是國民黨北京總支部的機關，事前鄭君並未對我說明。我住的房間是在後進中堂，是由客廳改成的。右邊正房住的是黨國元老丁惟汾先生（是北方本黨黨務總負責人）的女婿張瑞鸞，字紫籬，山東人，是我預科同班。平日穿的是藍綵袍八團馬褂，是

一位公子佳兒型的學生。左邊正房住的是何孟雄，湖南人，說是北大的旁聽生，却從未見他拿書本去上課，亦少見他坐著看一些書。鄭居之交給國民黨裏一些應辦的事，雖然很簡單，但總要抽出時間來處理，尤其填寫黨證一事，祇要有二位同志負責介紹新黨員，或者自己拉了二位黨員自動申請入黨，就要填寫一張給他。說起填寫黨證，不覺想起一件頗有趣味的事。前面提過十六年清黨的時候，我幾乎蒙受了不白之冤，幸賴洪陸東同學替我昭雪。實則，這時候，我和洪氏彼此不相認的。中間還靠物理系一位高材生和我且是同鄉姓沈名倫字敦五的同學自發自願向洪氏陳說。這時候他正在杭州，聽到有人控告我的消息，即進見洪氏，替我剖白。洪氏一方面聽信他的話，另一方面派他到臨海做清黨委員。他到任召集全體黨員講話時，有一個黨員要他把黨證拿出來看看。這句話竟使他自已退下台來。後來遇見我時深悔十二年多間有一天約我同去吃晚飯，我正在填寫黨證，沒有請我替他填寫一張。我說：「這種黨證現在已成古董了！就是一班中央委員，持有的恐怕還不多，何況普通黨員。你祇要反問一句，假使他也拿不出來。你可以回答他：『現在要研究的就是如何製定一種臨時性黨證就可以了！』」查過去的老黨證，不像現在的那樣簡便，填寫起來實覺麻煩，而且要用正楷，每每因此減少我讀書時間。同想到先生在五四運動時所說的「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的話，那時我正在求學時間，應當把讀書放在第一位。所下課，以一一就把門虛掩著來看書。這個姓何的，

好多次輕輕地推開我的門，探進頭來，好像要和我說話，見我不大理睬他，旋把頭縮回同時隨手帶回門。那時我始終把他看為游手好閑，是一個無聊的人。直到七八年後，無意中看到一本左傾刊物裏，才知道他不僅是一個有名的共產黨員，且是「反立三路線」的頭目。大約一年半以後，鄭居之回來，把從前交給我所有文件全拿回去，說他要搬到翠花胡同去住，隔壁姓何的隨同搬去。我和張紫鸞仍住在原處。此後北平的黨部有左右派之分，右派的機關在南花園。這兩處我始終沒有去過。鄭居之也很少來到我處，僅於十三年除夕前一天下午，他手裏拿著一面宣傳隊小旗，一張北京特別市黨部派令，和用大型名片紙寫成的「黨員臨時黨證」一枚，對我說：「明天下午五時左右，孫總理要從天津動身進京，黨部派你做宣傳隊長，領導各同志到前門東車站歡迎總理進京」。並交給我黨證說：「從前的黨證現在不用了」。翌日下午四時我即約集同志十餘人進東車站列隊歡迎。五時許總理專車到站停止後，即擠到車門旁想見見總理一面。是時暮色低沉，祇見丁惟汾及一個書長鬚子及其他許多人圍擁著總理登上靠火車門旁的汽車，即開動離去。直到十四年三月十二日以後，停靈於中央公園大廳中央，才親切看到慈祥肅穆的儀容，及在其黑髭中間，疏散幾點白霜，但已經閉目不能言語了！自瞻仰到總理遺容以後，深深警覺到像總理奔波一生，冒險犯難，出死入生，還不肯片刻丟掉書本。我何人斯，怎可虛擲這個寶貴難得時光，而不知努力為學。於是我決定此後專心讀書。不

久，南花園的李俊（字超英）同學約我去活動活動，我也推却了。十五年春，哲學系同班同學又是國民黨同志梁佩寰（字園東）來看我，一開口就說：「老曹，我又入共產黨了！」他於十六年武漢政府時期，曾做過全國農民協會總會秘書，武漢分共後退出共產黨，在各大學教中國歷史，陶希聖同學會稱他為「新史學家」。我說：「現階段的革命是國民革命，我們加入中國國民黨就夠了，何以還要進入共產黨呢？」「國民黨組織不行！」他回答。「組織好不好是在人為，共產黨能之，我們何獨不能？」——我說。他瞪著眼回答道：「組織這套東西，國民黨的先生們大都不肯留意的！」我馬上回答：「我留意，我一定會把這個問題仔細研究一番！」以後，我先把本黨「黨章」研究一番，後再把共產黨黨章比較研究一番，覺得彼此大同小異，而且沒有什麼難懂之處。又向書坊買了關於黨的組織和訓練一類小冊子多本來看，雖然有較進一層的研討，但並沒有什麼一套東西之存在。到了十五年冬間，偶然和一個左傾朋友談天，那位朋友說：有人問鮑羅廷：「黨的組織是什麼？」鮑回答說：「黨的組織跟黨的政治路線跑，黨的政治路線在那裏，黨的組織就在那裏。」我聽了這句話，才迷惑著了，於是想到對這問題作進一步研究，却始終得不到有圓滿答案的書。

### 研究黨組織及譯書

十六年夏間，我帶著掛在心胸的疑惑問題離開北大。以後想藉實際工作來體驗和考證胸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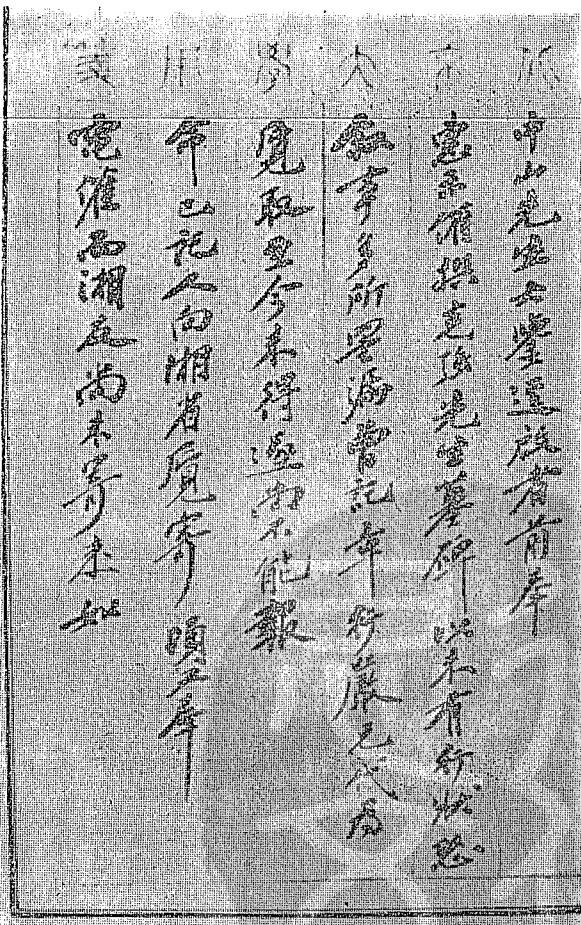
夕懸繫的問題，所以願做的事，要與黨務有關連。是年秋月，先任江蘇省農民協會總會秘書。十七年春，浙江省黨務指導委員會成立，訓練部由李超英同學擔任，該部分黨員訓練和民衆訓練二科，李同學叫我擔任前一科的職務，我就想把我平日研究的心得付諸實施，但事實所表現的和理想相去太遠，不到半年，即借赴法求學名義離開黨部，不料回到家鄉治理行裝時忽然患病，遲延未即出國，李同學知我未走，於十八年初夏又拉我回去幫忙，我總覺得黨的組織上級和下級不能呼應，全黨機體已成癱瘓，不到六月，又託故離去。此後想在正式黨部之外來做建黨工作，又成幻想。我自加入國民黨（以下簡稱本黨）以來，始終固守著總理「建國必先建黨」的遺訓，又感人微言輕，呼號無應，於是想在黨裏先謀得相當位置，再言其他。二十年冬間會逢浙江省黨部的委員舉行改選，我即報名參加，在競選活動時，竟將家中交我留法學費用用盡，事仍未成。統計十六年夏月離校起至二十五年冬月止約近十年時間，正式作事領取公家薪水不到三整年，其餘大都寓居上海幹我無報酬而却認為天經地義的建黨工作，其中出力不討好的苦味實非言詞所能表達，而且每年冬末還鄉，總會聽到雙親的責問和憐詢，父親說：「你為什麼把我辛辛苦苦替你籌好的學費投諸空谷裏？」母親說：「植（我乳名）吓！家裏不少你吃、不少你用，你為什麼在外面自找苦吃？」再回頭看一看昔年的師從，對我肯賜溫言和惠助的，亦只有先生一人。記得十九年六月間某一天上午，曾和先生作一次長談，

從哲學談到實際政治問題。在哲學方面，我反對用西洋哲學成果來解釋中國哲學問題，因二者不是同一範疇。在政治方面，當時剿匪工作正在積極進行中，我曾說：「要徹底解決中國共產黨問題不能專靠軍事，還賴政治，尤其要著重黨務。假使本黨真正成為有組織有訓練的實體，那末，中國共產黨自自然然會消滅了！」先生聽了後，臉上表現出嚴肅的笑容。後來馬復見到先生時，先生曾說：「我對曹立人兄看得很清楚」。在二十二年春間又曾替我函介當時任教育部部長王雪艇先生請我任督學之職。二十三年夏間又親函外交部次長代理部務的唐有壬氏，請他派我到英國或美國的大使館作事，使我得以在公暇進修。二事雖然都沒有實現，而恩德仍在！二十四年冬間我和馬復去見他時，他又拿出一厚本紅面英文書，是美國哈爾柏教授著的「蘇俄公民教育」，並對我們說：「現在商務印書館想把美國芝加哥大學的一套各國公民教育譯書完全譯成中文，其中德、意、美、日……諸國都已有有人承譯，祇有蘇俄一本還找不到人。前幾天王雲五先生特地為此事來託我代找，大概他們對書裏說到黨（共產黨）、團（青年團）的組織問題攪不清楚。我知道曹建對這個問題很留心，馬復是學俄文的，你們二人拿去試試如何。」我也想起國父在十三年本黨改組時說過：「這次黨的改組，其方法是模仿蘇俄的。」正想找這一類書來看，於是我很高興答應下來。出來後，我和馬復約定，我主譯，他擔任校正和抄寫。此時快到年尾，我就把這本書帶回老家。翌春，不幸我的母親病了，到

了三月梢即遭棄養。心裏的悲傷很久不能恢復正常。經馬復來函催促，於五月間才開始動筆，到了十一月，總算把這四十多萬字的鉅著譯畢。交稿後即到南京應友人之約任事。翌年五月間，先生來南京開會，住在鷓鴣寺中央研究院官舍，我去晉謁。先生一見我進來，微笑拉著我的手對他的周夫人說：「這位就是曹立人兄。」他的喜悅也許由於這本無人顧問的書，我在不算太長的時間裏就把它譯出來了。我也認為生平一件快慰的事。我的快慰是在於十年來橫在胸隔上一團疑惑，現在得到先生的指引，竟把它全部揭開了！

我仔細研究書中足滋困惑與癡結之所在，祇

蔡元培先生致 國父孫中山先生函墨跡。



有二個字。一是「賽爾」(Cell)。此字原義為小房子或蜂房。後來英人胡克(Hooke)用顯微鏡觀察樹皮的薄片，看見它的基本組織像蜂房一般，即以「賽爾」名之，日本人義譯為「細胞」。國父譯為「生元」。蘇俄共產黨因之亦稱基本組織為「賽爾」。本黨在舊「黨章」上稱為區分部，在新黨章上稱為小組。二是「弗蘭克遜」(Faction)，義為分散，或分離部分，但含有「有計劃分置」的意思。在數學上稱為分數。在本黨的老「黨章」上，譯為黨團。「蘇俄公民教育」「共產黨章」裏曾說：「賽爾」是從自然程序中發展出來的，並不能作任何用途。至於「弗蘭克遜」是

依黨作用之所在來分佈的，時常分置於各機關、各團體、各集體，或民衆聚集場所裏面，藉以增加黨的力量，哈爾柏稱之為「指導核心」。當黨要舉辦某一種偉業時，必先成立推行

機構，在該機構內，就應安置一套黨組織以為推動的力量，和指導的中心，所以藉以保障工作不致發現偏差，和計劃得能限期完成。總裁說：「黨的組織應與黨的工作相適應，及依黨的工作來定黨的組織。」其意義在此。蔣主席經國先生在抗戰時曾說：「黨務工作，應用黨團活動方式進行。」其意義亦在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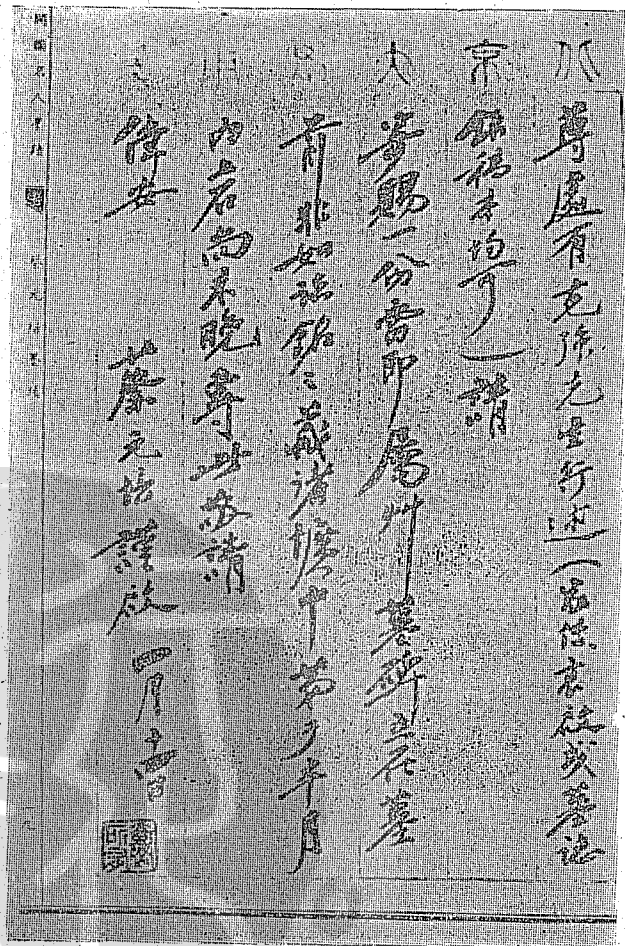
總理孫先生的手訂「黨章」原有黨團一章，十八年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因訓政開始，黨代表人民行使政權，用不著黨團來策動人民參預政治，故把它刪去了。

二十七年，本黨一方面對日抗戰，要鼓動民衆發揮濃厚力量，另一方面要籌備實行憲政。所以總裁於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集會時發表「改進黨務與調整黨政關係」訓詞中沉重提出黨團作用的重要和它設置的方法。因憲政時多黨並存，必有黨爭，有黨爭必須用到黨團。革命黨是有機組織，任何有機體，用則健，不用則廢。這時的黨久已消失黨團的機能了！

### 被人漠視的理論家

民國二十七年四月，我進入本黨（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工作，直至抗戰勝利，政府還都為止。在這一段時間裏，該部長長經過張厲生、朱家驊、陳果夫和陳立夫四位先生。我於是就過去研究黨的組織問題的心得坦誠對他們說，都幸得他四位先生的贊許。例如張厲生先生對我說：

「我也問過留俄、德、意各黨治國家的朋友



，他們都說：這幾個國家，沒有一國黨部的工作方式像我們這樣的。我們以後也要改變改變才是。『果夫先生在部中擔任部長不久就因病離開了，但我於三十九年來台，在鹿港中學教書時，那時適逢本黨正在改造，他老人家聽到我的工作情形，對我一個很熟識的朋友說：「怎可叫曹同志在中學教書呢？」即此一語，亦可以看出他老人家對我並不小視。立夫先生任部長不久，我因不慎跌傷右手右足，臥牀很久不能起立行動。但在未病時，他曾交辦擬定黨與團或小組的關係方式，我就照蘇俄黨與團的關係方式簽上，荷蒙先生稱善。其間以隨朱驩先生最久，待我亦厚。曾

部對我所說的大都是無動於衷。態度比較好的，則稱我為組織理論家，其態度壞的，竟呼我為「黨迷」！又如三十一年春間在中央訓練團受訓，當開小組會議輪到我發言時，我說：「打敗日本軍閥不成問題，成問題的是日本人敗退後，如何處置共產黨的問題。因為多黨並存，必有戰爭，施之於和平則是政治戰，施之於戰爭則是軍事戰。我們的黨現在組織鬆懈，缺乏領導民衆的力量，不論政治戰或軍事戰恐怕都不過人家。」言甫畢，全組同志譁然，說我的思想反動，斥罵交加，幸賴指導員胡軌同志加以勸說，才歸平息。抗戰勝利後，中國前途呈現出燦爛遠景，許多同

記四十六年秋間與內子郊遊，途遇先生騎馬迎面而來，看見我們，即下馬互相寒暄，內子愕然。時先生正新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之職。只有一般中級黨務幹

事，想升官的升官，要發財的發財，但我如戰國時的杞人一般，在那裏憂天之崩，地之裂，株守南京，毫無所事。這時候，已經見不到慈愛賢哲的吾師蔡先生指引出我於迷失疑惑的路了！三十九年避難來台灣，不久正逢本黨改造，我認爲關於黨的組織問題，全黨同志必會提出好好討論和研究，我也曾寫了一點東西向各報刊投稿，但始終看不到有發刊出來的。後來自己出錢，好多次印出我對黨務改進的意見，分送給黨裏有地位的朋友或負責同志，但從未得到回音，大概僅替廢紙算增加一點材料而已！

我於四十年前得到吾師蔡先生的提示，對於黨的組織問題雖不敢說透徹了解，但敢說已經得到門徑。回頭說一說中國共產黨人，他們雖自稱爲懂得組織，我敢說他們還是僅知皮毛。三十一年冬間，我曾對在中共做過許多年「中央組織部長」後因和毛匪澤東鬧翻歸誠本黨的張國燾同學說：「我前在中共出版物上看到把黨員認作細胞，本黨同志不察，亦有仿認。假使認黨員爲黨的組織細胞，則有何組織之可言。應把區分部或小組視爲細胞，黨員是細胞內的分分子，才合組織原理。」張氏默然。又第一次本黨代表大會時，李大釗在大會上聲明：「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係以黨員個別加入，並不是想在國民黨內發生黨團作用。」在容共期間內，共產黨人對它自己的小組會議十分認真，對於國會黨的區分部會議則擱置不理。對於吸收新黨員，自己的黨，考查又考查，對於國民黨，即採拉夫的方法。又如要叫國民黨員做什麼工作，必先在它自己小組裏討論決定



，此非黨員作用為何？但李氏確是一個忠厚木訥之人，為北大師生所信服，而非一班狡獪無行之流，他在大會上作此言，我們只能說他對黨團的涵義並非真實清楚的。

### 俄共組織源出洪門

現在我對蘇俄的共產黨作再進一步研討。蘇俄共產黨之有「弗蘭克遜」，實在傳自中國。我們只要看一看施利高（Schlegel）所著的「天地會」（Heaven Earth League）和士多令（Strine）與瓦特（Ward）合編以『洪門』The Hing Society」一書所用之重要組織名詞，就可以知道。天地會或洪門會的基本組織為「房」，如「蔡房、方房、馬房、胡房、李房……」（該會原列次序）等，此「房」字中文原義是家屬的支派，西人中文程度差遜，竟就字面來譯而成為「房屋」：「賽爾」（Cell）。對於組織的分離散佈，換一句話說，就是要二三人在一起，就能態度一致，語言一致，主張一致和行動一致，則譯作「弗蘭克遜」（Faction），堪稱妥當。此字在數學上為分數，由分母與分子構成，基本組織如分母，分散組織如分子，分母可以變成許多分子。又分母如為實數，分子然後能滋生許多不同實數；如分母為虛數，則分子亦是虛數了。就黨的組織來說，有了健全的區分部或小組，然後有健全的黨團或黨組；如區分部或小組名存實亡，斷不會產生出健全的黨團或黨組了。我又認為對於「弗蘭克遜」一詞應譯為分散組織或散置組織，現在譯作「黨團」或「黨組」，容易使人發生誤解，因之衍成有人把黨部所設立的民衆

團體認作黨團及臨時發動各類型之羣衆活動為黨團活動的笑話。在俄共，把「黨的組織」和「羣衆組織」分別得清清楚楚。如黨的基本組織和分散組織及其上層的指導組織和監察組織，稱為黨的組織；把黨部所成立的民衆團體、生產集團以及政府各機關等等統稱為羣衆組織。再則，天地會的組織成員，國父在「建國方略」中說他們都是一班「江湖旅客無家游子」。此語西人把他們譯成「普羅列塔利亞」（Proletariat），其原義相當於羅馬古代下層的貧民。現在共產黨則把它改稱為「無產階級」，而成爲社會革命的主力軍了！

天地會或洪門是滿清康熙年間一班反清復明的革命志士所創立，有些人則說是成立於明鄭時代，其創始人是陳永華，發祥地在台灣，後來其組織分佈於福建、兩廣一帶，再傳入內地各省。在沿海各地的會黨因受清廷嚴厲的壓迫或捕滅，因之逃避到南洋各地。當歐洲各國佔領南洋各地時，感覺到這班華僑之難統治，研究原因之所在，才知道有這種團體的存在，進而研究這種團體的組織原理和方法，並著成許多專書。上舉二書是比較最著名的。世人都知道馬克思是一個博學深思的人，平日出入於英國各大圖書館中，對這類書沒有不看的理。又世人知道所謂馬克思主義是採合黑格爾（Hegel）的辯證法和費爾巴哈（Feuerbach）的唯物論而成，很少人知道他還吸收入中國清初的革命黨人所發明的天地會或洪門的組織原理和方法。黑費二人的哲學，純爲學理的，無任何危險因素在內，及吸取中國先賢所發明的革命黨組織原理，才把他的主義武裝起來，而

成爲擾亂世界安寧的利器！不過他所學去的還是皮毛。例如列寧說過：他的黨是經過持續不斷的鬥爭鞏固起來的。不錯，我們固有的革命黨——會黨——對於非我的原有排他性和戰鬥性，但僅是一種手段或方法，並非目的或原理。我們的組織原理不是繼續不斷的鬥爭，而是始終如一的道義。道義才是黨的組織精神和原理。

蔡老師！以上是我向您在天之靈掏誠的報告。回憶四十年前，您沉重的將一本厚厚的英文書交給我們譯成中文，我總算不負您的囑咐；同時，藉以探悉蘇俄共產黨核心組織之所在，及它傳受之所自。且得用以比較本黨組織得失之所在。但我的成就，僅到此而止。如想再進一步有所報効，自愧庸愚，迄今難以應命！現年已老大但是對於總理總裁「建國必先建黨」的遺訓，耿耿猶存，仍思奮我餘力，以促成本黨組織的健全，庶幾不負吾師在世時種種垂愛之情！

### 敬告留學生家長

慰藉 貴子女異鄉作客寂寞的最佳禮品，便是爲他們訂份中外雜誌，請將 貴子女在國外詳細地址填妥，連同全年訂費新台幣伍百元（折合美金拾肆元連郵費在內），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本社立即按址按期寄書，省錢、省時、更省事。